

安逸的离岛

■朱其

去了韩国,在光州美术馆与一批年轻艺术家对话。忽然发现新一代的艺术不再有什么韩国艺术、中国艺术、欧洲艺术、美国艺术,国家特征越来越少。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与上一代人不同,但彼此相像,就像来自同一个安逸的离岛。韩方让我评价一下韩国的年轻艺术家,我表达了一些印象:一、找不到最好的作品,也找不到最差的作品,都很有感觉,但没有激情;二、语言上,越来越受艺术设计、时尚插图和装饰艺术的影响,有艺术工艺化的趋向;三、新一代注重自我和艺术的关系,好像只管把自己变成一种隐喻形式,而不是将其放入精神史的框架去观看。

总体上,新一代的艺术比商业艺术更个性,但在思想上缺乏知识分子视野,不关心历史、政治和社会议题。因此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比商业艺术高级一些,比艺术的知识分子精神低一层次。我此番印象不完全来自韩国,欧美、中

听“吹”

■蒋子龙

河北有首著名的管子曲《吹歌》,婉转高拔,清妙入神,令人百听不厌。吹如歌,吹胜于歌。吹是一种技巧,一种艺术。其实吹奏器乐、吹糖人、吹玻璃器皿等等,固然也是一种本事,若跟“吹牛”相比,不过是雕虫小技。不可误会,“吹牛”早已不再是贬义词,时下满天飞的段子、笑话、小道新闻等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爱“吹”和听“吹”的需求应运而生的。各种各样的聚会、饭局,也绝对少不了“吹”和听“吹”。能“吹”跟能“侃”差不多,凡有人群聚集、特别是在旅行途中,擅长“吹”的人总是最受欢迎,到哪里都被簇拥、被围护,他那一具翻转流利的舌头就是大家的快乐之源。

我曾聆听过“大师”之“吹”,当时观他的风貌,不过60岁上下,可他记不得自己到底在世上活了多少年,或许八九十年,或许一百多年了,他只记得曾经历过20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年轻时还不知道自己身有绝技,在七楼的阳台上跟朋友们聊天聊到兴奋处,起身走下阳台,朋友们都吓坏了,待他落到地面却不痛不痒,返身又走到七楼的阳台上……当我用文字记录下他的奇迹,不要说别人,连自己都不大相信,可当时听他讲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怀疑。这就是真正的“吹”,能让人忘记他是在“吹”,即古人说的“巧言智者难防,听之丧其所守,至死不疑”。何况我算不得是什么“智者”,但“大师”的身边却不乏智者,他们有高级工程师、著名文化人等,却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左右,过着“野营拉练”般的生活,对

味儿

■北岛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邻里间互相照应,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煤烟味儿。为取暖做饭,大小煤炉炉峰离煤炉像烟鬼把烟筒伸出门窗,喷云吐雾。而煤焦油从烟口落到地上,结成一坨坨黑冰。赶上刮风天,得赶紧转动烟筒口的拐脖——浓烟倒灌,呛得人鼻涕眼泪,狂嗽不止。更别提那危险的煤气,趁人不备,温柔地杀你。

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北京冬天的底色。它是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罢了活,千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疼。

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深吸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喊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一边喷吐哈气,一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我家离后海很近。孩子们常在那儿“滑野冰”,自制冰鞋雪橇滑雪板,呼啸成群,扬起阵阵雪末儿,被风刮到脸上,好像白糖一样舔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儿。工人们在湖面开凿冰块,用铁钩子钩住,沿木板搭的栈道运到岸上,再运到李广桥北面的冰窖。趁人不注意,我跟着同学钻进冰窖,昏暗阴冷,水腥味夹杂着干草味。那些冰块置放在多层木架上,用草垫隔开,最后用草垫木板和土封顶。待来年夏天,这些冰块用于冷藏鲜货食品,制作冰淇淋刨冰。在冰窖里那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冷冻的鱼。

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跟巴巴盼着春天。数到“五九”,后海沿岸的柳枝黯然转绿,变得柔软,散发着略带苦涩的清香。解冻了,冰面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雪水沿屋檐滴落,煤焦油的冰坨像墨迹涸开。我们的棉鞋全都变了形,跟蜘蛛一样趴下,咧着嘴,有股咸带鱼的臭味儿。

我母亲几乎年年都买水仙,赶上春节前后悄然

国、日本的年轻艺术家也几乎都是如此。这并非责怪,只是描述一种新的特征。我对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品也不满意,但有时又觉得他们也只能这样了,因为他们成长于一个安逸的时代。

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社会动荡和苦大仇深的生活,基本的物质生活都能得到满足,成长于有电梯、汽车和包豪斯设计的都市环境,得到长辈的平等对待和鼓励,同步获取国际化信息,日常用品包括全球化的手机、私家车、T恤衫、游戏、流行歌曲、影视剧等,这些跨国公司的用品使日常生活变得艺术化。残酷的政治和一部分人的贫穷生活还存在,但城市的政治局限在政治圈,贫困人群则在边远地区,大部分从事当代艺术的年轻人接触不到。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后,政治、社会和自我依然有问题,但所有问题都是结构性的。人们在超市、影院、博物馆、百货大楼、酒吧、办公室和社区住宅等生存空间感受不到直接痛苦,但还是一种渺茫或孤独感。像韩国,进

其言必称“大师”,奉若神明。如果说“大师”是“吹”,他们对“大师”就是“大吹”,或“吹大”。

“爱吹”和被“吹”,也许是人的天性,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能跟“吹”沾上边儿,或者“吹”过,或者听别人“吹”过。活一辈子说每一句话都实事求是,对每一件事都宁说不够也不说过头的人毕竟太少了。只要看看各种各样的会议,真正自甘寂寞、始终闷声不吭的人很少,更多是想语惊四座,或者讲一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博得会心大笑的话。

“爱吹”和“能吹”,“会吹”不是一码事。能把人“吹”得哈哈大笑、浑身舒服,或惊叹不已、五体投地,还只是嘴上功夫。能“吹”出一番事业,那才是大本领。比如开放之初的“吹坛”霸主,其成名的段子是“用罐头换飞机”,然后就夸下海口:要给海军捐献一艘航空母舰,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300公里长的大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吹过来,使寒冷干旱的青藏高原变成江南;在5至10年内跻身世界五百强的前十名……舌头是祖传的宝物,不用白不用,用了不可白不用。只可惜,这位能人至今可能还蹲在监狱里。但他给“吹坛”做出的表率是:“吹”起来要百折不挠,花样翻新,“吹”出勇气、“吹”出想象力,“吹”出大境界、“吹”出恒心,还要善于从“吹”的实践中总结“吹”的理论。

这应该也是商品社会的调剂品。随着商品的极度开发,“吹坛”高手们是不是也要常“吹”常新,永“吹”不休?

(节选自《新民晚报》,2012年7月15日)

开放,暗香涌动,照亮沉闷的室内。在户外,顶呱呱花开得最早,随后梨花丁香桃花,风卷花香,熏得人头晕,昏昏欲睡。小时候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时尚不知有花粉过敏一说。

等到槐花一开,夏天到了。国槐乃北方性格,有一种恣意妄为的矜厉之美。相比之下,那淡黄色槐花开得平凡琐碎,一阵风过,如雨飘落,槐花的香味儿很淡,但悠远如箫声。

暴雨似乎来自体内的压力。当闷热到了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一连串雷电惊天动地,青春期的躁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雨一停,孩子冲向马路旁沟上,一边蹚水一边高叫:“下雨啦,冒泡啦,王八戴上草帽啦……”

不知为什么,秋天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开学的缘故:自由被没收了。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头的霉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

(节选自《城门开》,北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城市剃刀

■杨小彦

近30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事情,从视觉来看——或用一个学术点的词,从表象来看,是城市的急剧扩张。今天的中国到处充斥着各种奇特的城市化景观,尽管这些景观外表似乎有很大差别,但其中显露的张扬气派,却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城市化扩张的建筑外观,不仅在追逐奇异的效果,而且丧失了对外空间人性化的合理配置。传统城市那种亲热无比、饶有趣味的挤压与安排,大概只能到香港的上环和日本的京都去寻找了。

中国绝大多数大城市已失去了昔日的温馨,在张扬的气派中远离了原有的记忆。管理者们,由于少有独自穿越马路行走的经验,动辄就大刀阔斧地分区,规划出一条宽大的马路,并轻率地在漫长的节点上修建高高在上的人行天桥。其

入了一个中产社会,不会再有更好的发展,也不会再有更坏的生活。在中产社会,一种生存之安逸又无聊、发展之停滞又心有不甘的复杂感成为一种自我单调。

在光州碰到一个当地报纸的中年女记者,她说,她那一代年轻时参与民主运动,热衷于讨论政治,但青年一代不再关心政治和社会。年轻的艺术家在画面上寻求浮世绘式的装饰风格,将自己经验中的冰淇淋、漫画、玩具汽车、布娃娃、舞会假面等图像放入画面。这让老一代看了觉得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但年轻人的经验中除了这些没有别的。

新一代的创作越来越像在制作一件奢侈品或高级时尚产品。问题还在,但结构化了。就像一幢房子,每个房间的每一个局部都很漂亮,一个人站在其中一个点所看到的局部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整个大楼的结构。对于结构性问题,需要掌握系统知识才能意识到,即所谓知识分子视野。有知识分子视野的人,站在楼道口就能感觉到总体结构出了问题。年轻艺术家普遍接受过学院教育,但



图片来源:昵图网

沈龙朱谈父亲沈从文旧事

■刘红庆

自嘲当年“狼狽相”

沈从文从湘西初来北京时,异常艰难。他以小学毕业生的水平闯文坛,并且文字还看不出特色。到了云南,他在家,和孩子们说起从前,很有一些自嘲精神。沈龙朱记得,父亲文字成绩之差,在家里是当笑话来讲给孩子们听的。

孙伏园当年主持《晨报》副刊,沈从文给人家投稿,大量地往那儿塞自己的东西。结果,孙伏园在朋友面前把沈从文的稿子粘成一条长条,展示给别人看,然后说:“你看,这篇文章是一团糟,一塌糊涂!”

说罢,孙伏园把沈从文的投稿扔到纸篓里去了。

沈龙朱说:“这是很刺激人自尊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小时候,父亲是当做笑话给我们听的。他对自己早年的狼狽相,当笑话来看待。”

我问:“孙伏园是当着沈从文的面吗?”

沈龙朱说:“没有,没有当着沈从文的面。但是这个事儿后来传开了。沈从文自己也说,实际上这件事促使他发奋写作。沈从文努力吸收好多东西,用各种方法去试探,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篇又一篇。父亲对孙伏园,丝毫没有怨恨。我想,这个故事确实反映出父亲努力从艰难困苦、恶劣环境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后来,沈从文和孙伏园没有太多联系。沈龙朱说:“其实孙伏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开创性地把报纸副刊开辟成一块园地,培养了大量人才。父亲可能也看到这一点,觉得自己可以往那儿投稿,但是父亲不知道自己的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当时,父亲应该知道自己水平是不够的,但是他愿意尝试,努力改,不行再改,改了再送。为了生活,为了吃

美术学院的训练越来越技术化,缺乏知识分子的思想训练,这使得当代艺术只有技术美学而没有精神议题。这就是新一代艺术家面临的盲点,只有对局部的体验是感受不到问题所在的,艺术家的内心必须装着一个知识结构才能发现问题。

世界资本主义到了这个阶段,为普通人创造了一个个安逸的城市社区,但这些社区就像一个安逸的隔离区或城市离岛。人们见不到深居在城堡、市政厅、高楼复式公寓的新贵阶层、政治家或资本家集团,实际上是后者控制着这个世界。离岛上人的生活安逸,但他们好像被抛到了一个天堂陷阱里。

阶级因为城市离岛的区隔难以再发生冲突,但阶级对结构的控制还在,由此导致离岛上的白领阶层及年轻一代的自我转变——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影响。但年轻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年轻一代成长于这些安逸的离岛,他们跟过去的历史隔断了记忆,并像一群新人独自飘往另一个方向。
(节选自《新周刊》,第369期)

谈人生首先要谈人的维持生存,一切为维持生存而做的劳动、工作、奋斗都是正当的,是不应该回避和无视的。相反,一个人从来不为生存而操心操劳,从生下来就是吃着现成饭,穿着现成衣,住着现成

房,然后吃饱了喝足了为人生的终极意义而发表高论——这样的高论恐怕是靠不住的,至少是极特殊的、没有多少普遍意义的。因为他或她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那么自然的,它没有代表性,没有或较少有参考价值。他可能成为天才,成为一代宗师,成为怪异,成为兼备一格的或一鸣惊人的风景;也可能或者说是更可能成为不可救药的空谈家,成为自大狂,成为准精神病患者。

我自1958年多次下乡劳动,这样的劳动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要关注生存问题,要关注粮食、蔬菜、居室、穿衣、燃料、工具、医药、交通、照明、取暖、婚姻、生育、丧葬、环境……诸种问题。世界上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正是自己的与亲人的、同乡的、同胞的生存问题,愈是发达国家的人愈是如此。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里,一个普通人最关心的是取得一份好的工作,是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屋和汽车,是财产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

在美国,有的人从年轻劳动到死甚至还没有足够分期付款的房屋,就是说他们倾其一生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这很正常也很正当。我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影片的名字叫《生命如屋》。讲的是一个癌症患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以疯狂的热情拆毁和重建了他的房子,临终遗言说,他的生命已保存在他的屋中。

就是说,不要轻信那些漠视人的生存问题,捏着鼻子蔑称之为“形而下”的纨绔子弟的牛皮大言。一切不关心人们的生存条件、生存质量的理论,都带几分云端空论、大而无当的可疑之处。

就是说,你为生存而从事的工作、劳动、事由,你为之花去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是值得的、甜蜜的与健康的,至少是正当正常正派的。你的快乐虽然不仅限于生存本身,但也就在生存中不是仅仅在生存以外。

人欲可能有恶性泛滥的危险,它需要调节、引导、控制,但这种引导和控制并不视人为敌。很简单,没有自我调节与控制,人类就不能很好地生存;而没有生存的欲望,没有改善生存的欲望,也就发展不起理性和智慧。毕竟人的欲望不仅是肠胃与生殖器直到四肢的欲望,也包含了大脑和心灵的欲望。

这样,你就会与多数普通人找到共同语言,你就不会轻率地否定旁人,抹杀旁人,你也不会动辄暴露类似的诬妄、狂躁、凶恶、愚蠢的人性恶,你就会调准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你就会踏踏实实地生活在地面上。

这样,你还会具备一个远不够但却却是起码的符合健全理性的是非标准,你可能仍然掌握不了真理,但你至少不会轻易上当,因为你懂得了一点常识:有利于改善人的生存境遇的一切思想理论见解有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未必是足够的但是理想的。

而一切从总体上就不叫人生存,不叫人好好地活着,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生存质量的胡说八道却令人不屑一顾,不论它打出什么样的伟大旗号。这当然并不是排斥在特殊情势下个体为了集体、为了国家民族所作出的牺牲,这些牺牲也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它们是为了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为了灭亡而作出的,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教义,不是为了冲动而牺牲,更不能强迫旁人为了一己认定的价值而牺牲。多数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好的理念是和生存一致而不是相悖的。

例如当一个人人为的灾难终于过去,人们不敢去谴责灾难的制造者,不去认真地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而是群起责问幸存者:你为什么活下来了?活下来成为一些人永远远的耻辱,成为叫他们抬不起头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质问也许正辞严,然而毕竟只有自身活着的人才可能发出这种谴责,这使我们不能不对之进行分析和掂量。因为生存权毕竟是第一位人权,而一般情况下,活着的人责备另一个人的活着,似乎不必那么高高在上。

(节选自《我的人生哲学》,王蒙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和管理的开始。从此,广州逐渐丢弃平实小巧的传统,发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空,一直到大学城,全然不顾实际使用的人性化,竞相追逐起北方城市的阔大风格,把潮湿而温润的南方甩到了遥远的南海,也把我们对于传统的依恋扔给了永不轮回的黑洞。

我们在追赶现代化。不仅是迫不及待地追赶,甚至是不顾一切地追赶,就像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不顾一切地痛骂自己的祖先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那样去痛骂自己的祖先,我们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世界上大概也没有我们这样的一所大学城,一年时间就建成了,然后使用者要在阳光暴晒下匆忙赶路,从这一区到另一区,而且每天来回几趟。

什么时候,城市的管理者放下了手中的“剃刀”,我们的城市大概才会回归人性。
(节选自财新《新世纪》,2012年3月31日)

生命如屋

■王蒙